



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田蓬鹏,潘子纯,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作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正逐步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选取中国18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论证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2012—2021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居于领先地位。新质生产力呈波动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发展态势最好。实证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异质性分析揭示,在东部地区、人才禀赋及数字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且具有动态影响效应。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城乡融合发展; 技术创新; 产业转型升级; 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0;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4)06-0012-13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4.06.00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现阶段的城乡融合发展面临融合水平偏低^[1]、城乡要素流动不畅^[2]、公共资源分配不公^[3]、城乡空间格局有待优化^[4]等难题,加剧了城乡发展的失衡态势。城乡融合发展的滞后,直接制约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构成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乡村全面振兴,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关于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首先,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尽研究,主要聚焦在基础设施、经济、制度、资源、技术和社会发展六大维度^[5-6];其次,在实践层面,众多学者也从优化资源配置^[7]、要素市场改革^[8]、公共服务均等化^[3]、产业升级^[9]等角度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已步入改革攻坚期,传统路径后继乏力,迫切需要注入新发展动能。因此,诸多学者开始从数字经济^[10]、科技创新^[11]、社会服务金融化^[12]、生态价值实现^[13]等方面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事实上,这些路径基本涉及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优化、产业转型升级三方面,本质上都是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与表现。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4]。概括来讲,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将以往细碎化、零散化的路径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发展框架和综合路径,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新指引。

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和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而言,新质生产力更是推动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15]。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城乡融合注入了强大动力^[16],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加快形成

收稿日期:2024-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22&·ZD113)。

*为通讯作者。

以城促乡、城乡融合的进程^[17-18]。这些研究均在理论上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外,也有部分文献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发展中的要素流动^[19]、产业协同发展^[20-21]、公共资源配置^[17]以及生态环境保护^[22]等方面的影响,但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因此,系统性地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这不仅契合国家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需求,也是当前时代赋予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使命。

新质生产力能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推动城乡融合。鉴于此,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剖析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洞见和实证依据。本文力争在以下方面做出探索:第一,由于系统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时间较短,目前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理论探索角度展开。本文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为通过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证据;第二,本文旨在厘清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在理论上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其实际应用亦呈现出良好的匹配度与互补优势。从理论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强调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8]。因此,要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在于推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现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跃迁。此外,新质生产力追求更高效、更可持续、更公平的发展模式^[23],这也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相契合,旨在推动城乡发展达到更高水平,并实现公平共享。在实践层面,囿于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性,目前城乡融合发展仍然存在要素流动的失衡^[24]、产业融合程度低^[8]、城乡空间尚未完全互联互通^[4]、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3]、人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关系受损^[8]等问题,而新质生产力恰好具备改善这些问题的能力。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能够建立健全统一要素市场,确保要素流动顺畅、有序^[19],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5],也能推动城乡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提高信息通达度。同时,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数字化管理,提升治理效率,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17,19]。此外,新质生产力也能实现产业绿色化转型,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格局^[25]。因此,城乡融合的发展需求与新质生产力的功能供给之间形成了高度契合的关系。综上,提出如下假说:

H₁: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 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由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而催生,这些维度的特征和功能表现尤为突出。此外,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上述三大驱动力,有效促进区域发展的加速,赋能城乡融合发展^[17]。因此,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阐述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1)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与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然而传统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升,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亟待新的技术加入。而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对传统技术的革新,进而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传统要素、产业、公共资源等进行升级优化,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如远程教育和在线医疗等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种技术创新也强化了城乡间的交互与联通,将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生活等环节相融合,实现跨地理空间、时间的城乡融合发展^[26]。除了赋能革新传统技术外,新质生产力本身作为一种新质态,也催生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涌现和应用。与传统生产力依靠渐进型增量式的技术创新不同,

新质生产力形成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群^[27]。这种更加高效、更具韧性、更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将为农村提供新的发展动能。一方面,在技术创新驱动下,乡村旅游业、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本回流,有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和要素融合也推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融合,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2)新质生产力、产业转型升级与城乡融合发展。大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在产业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28]。因此,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过程,可以从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的跃迁两方面阐述。第一,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逐步淘汰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环境污染、高生态破坏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借助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水平、高效能、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29],逐步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化^[21],促进生产管理的智能化^[30],引领产业结构高端化^[20],也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的绿色化转型^[31],从而通过自主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和绿色化这“五化”协同发展^[27],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够助力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实现,这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过程。比如,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吸引人口向城镇集中,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第二,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跃迁,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实现从粗放型产业到集约型产业的根本转变。这一进程不仅调整了原有的不合理产业结构,而且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促进了各产业的协调共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使得城乡按照自身优势布局相关产业,不仅丰富了城市市场的多样性,也为农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不仅推动了城乡产业的共同繁荣,更在逐步缩小城乡产业差距的过程中,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面实现。

(3)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当前城乡资源分配失衡,资源配置进程异化,直接阻碍着城乡融合发展^[7]。新质生产力是乡村资源配置优化的关键要素,能高效整合农村与城市的生产要素^[16],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合力优化资源配置^[32],提高资源使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基本逻辑在于:第一,从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来讲,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技术变革为要素的组合配置提供了新工具^[25],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助力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与实际生产情况,使得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组合和高效配置成为可能,减少资源耗散,提升配置效率。第二,就组织管理创新的软实力而言,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组织业态革新,通过构建智能化、平台化生产组织形态,实现生产流程、人员配置及资源利用的高度协同,优化管理流程,显著提升整体生产效率^[33]。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无人工厂”与“虚拟车间”成为可能,极大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34]。而新质生产力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能确保城乡间的资源流动更为合理高效,使得农村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经济活力。譬如,盖庆恩等^[35]就发现,若土地资源能得到有效配置,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将分别提高1.36倍和1.88倍。同时,优化资源配置也能够促进城乡产业高效、高质量的发展。通过引导资源向城乡交界地带及农村新兴产业集聚,有助于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格局。此外,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助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总之,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通过加快产业升级和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6]。

由以上分析得出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如图1所示,并提出如下假说:

H₂: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H₃: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H₄: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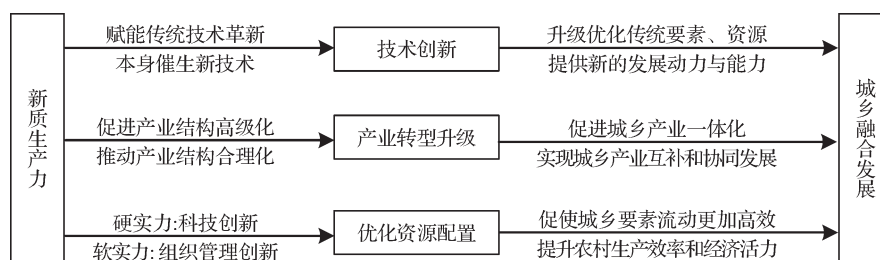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

二、研究设计与典型事实分析

1.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理论假说,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Iurd_{i,t} = \alpha + \beta Nqpf_{i,t} + Zcontrol_{i,t} + v_i + v_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i 和 t 代指各城市与时间, $Iurd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 i 城市在第 t 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Nqpf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 i 城市在第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α 、 β 、 Z 为待估参数,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β ,其代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 $\epsilon_{i,t}$ 为误差项, $control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v_i 、 v_t 分别代表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2. 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等。其次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网络资料补充,最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企业新质生产力测度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的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研究对象为2012—2021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样本,因为部分城市不存在上市公司,无法匹配到新质生产力数据,同时剔除掉其余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最终形成180个城市10年平衡面板数据。

3. 变量测度

(1)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形成了不同体系、维度、层次的测度结果,但核心特点都是围绕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创新。宋佳等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从活劳动、物化劳动、硬科技、软科技等四方面,选择了研发人员薪资占比、研发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等11个指标体系测度中国上市公司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36],本文以这一数据为基础数据。同时,借鉴郭峰等^[37]的做法,将上市公司按照所在地整合到城市层面,并以某地上市公司水平的均值来代表该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选择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整合的原因是:一方面,上市公司通常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其经营状况、创新能力等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城市在这一领域内的发展水平,且极具代表性,能够充分代表整个地级市最先进、最顶尖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包含直接或间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各种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数据获取相对容易且较为全面。同时,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整合成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这一做法,也能有效减轻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两个综合测度指标间的相互干扰和相关性,增强其独立性。

(2)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学术界从“人、地、资本”^[7]“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和空间”^[38]“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39]等方面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尽管研究者的指标体系各有侧重,但大体上均涵盖了城乡融合的经济和要素流动、公共资源和服务、空间互动三个核心维度^[4,40]。因此本文从“经济融合—资源服务融合—空间融合”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此外,城乡融合发展,既是过程,也是状态,更是目标,其指标体系应包含反映城乡差异情况的对比类指标、揭示城乡发展状态的状态类指标,以及体现城乡互动的动力类指标^[13]。本文力求兼顾对比与状态两类指标,辅以动力指标,以全面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的真实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无法从地级市统计年鉴中获得的对比类指标,借鉴郑瑜晗等^[38]的做法,利用《县域统计年鉴》,在县域层面将非市辖区的县域

与市辖区进行汇总比较,从而获得对比类指标数据,能够有效揭示城乡差距。具体的指标及其含义详见表1。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12—2021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表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单位	类型	属性
城乡 融合 发展	经济 融合	经济发展	人均GDP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状态	正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对比	负
			农业产值	农业生产产值	万元	状态	正
		产业	二元对比系数	(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二、三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	对比	正
			固定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状态	正
		资本	固定资产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固定资产之比-1	%	对比	负
			非农就业比	非农就业人数/农业就业人数	%	对比	正
		劳动力	年末单位从业人数	反映劳动力供给水平	万人	状态	正
			城乡面积比	县域面积/市辖区面积-1	%	对比	正
		土地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反映土地利用强度	平方米/人	状态	负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反映农业技术水平进步	千瓦/人	动力	正
		技术	科技财政支出比	科技财政支出/财政总支出	%	动力	正
			师资力量	每万名小学生拥有的教师数量		状态	正
			教育条件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中小师生比的比值-1	%	对比	负
		教育水平	社会保障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状态	正
			社会保障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1	%	对比	负
	资源服务 融合	社会保障	医疗条件	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卫生床位数		状态	正
			医疗条件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卫生床位数-1	%	对比	负
		医疗卫生	图书数量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藏量	千册	状态	正
			图书数量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藏量之比-1	%	对比	负
		公共文化	土地城镇化	建成区面积/行政区划面积	%	状态	正
			土地城镇化集聚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	对比	正
	空间 融合	空间集聚度	城乡流通网络	道路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	状态	正
			路网密度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状态	正
		交通承载力	建成区绿地率	反映区域生态本底	%	状态	正
			污水处理率	反映城乡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能力	%	动力	正
		生态承载力	互联网入户率	宽带接入用户/总户数	%	状态	正
			互联网入户率差距	县域与市辖区互联网入户率差距之比-1	%	对比	负
		信息承载力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2,10],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居民储蓄、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

(4)中介变量。选取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的中介变量。①技术创新。发明专利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因此以地级市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表征变量。②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多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表征产业转型升级。干春晖等^[41]认为,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推动下的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其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因此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在对泰尔指数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利用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产业增加值等指标,测度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以此来表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基于此,本文借鉴其做法,测度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数,共同表征产业转型升级。③优化资源配置。以资源配置效率来表征。现有诸多研究多以资源错配指数的倒数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42]。因此,在参照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资源错配指数:

$$mis_{K_{it}} = \frac{mp_{K_{it}}}{r} - 1 = \beta_{K_{it}} \frac{y_{it} p_{it}}{r K_{it}}$$

(2)

$$mis_{L_{it}} = \frac{mp_{L_{it}}}{w} - 1 = \beta_{L_{it}} \frac{y_{it} p_{it}}{w L_{it}}$$

(3)

其中, $mis_{K_{it}}$ 、 $mis_{L_{it}}$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扭曲系数,用以代指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二者之和为资源错配指数。 $mp_{K_{it}}$ 、 $mp_{L_{it}}$ 分别为*i*城市第*t*年的资本、劳动力边际产出, r 、 w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r*设定为10%,代表5%的折旧率与5%的实际利率^[43],劳动力价格以当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征(以201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平减); $y_{it} p_{it}$ 为名义产出,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GDP)衡量(以201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平减); K_{it} 、 L_{it} 表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总量,资本存量以永续盘存法对各地区固定资产进行估算,资本投入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测算。劳动力总量用年末就业人数衡量; $\beta_{K_{it}}$ 、 $\beta_{L_{it}}$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产出弹性,构建C-D生产函数进行估算。

$$\ln y_{it} p_{it} = A + \beta_{K_{it}} \ln K_{it} + \beta_{L_{it}} \ln L_{it} + \mu_{it}$$

(4)

因为资源错配指数存在配置过度($mis < 0$)和配置不足($mis > 0$)两种情况,故取绝对值。并以资源错配指数的倒数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表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1800	
变量	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融合发展	根据熵值法测度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49.973	2.763	40.801	59.051
新质生产力	根据熵值法测度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将均值匹配到城市层面	4.885	1.257	2.236	7.806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对数	7.581	0.808	5.358	10.031
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人口数量/(万人/平方千米)	0.045	0.035	0.001	0.267
政府干预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	2.635	1.433	0.896	14.436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1.477	0.568	0.486	4.070
居民储蓄水平	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比重/%	0.839	0.348	0.083	2.907
人力资本	计算在校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6×全市小学生人数+10.5×普通中学生人数+16×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 ^[10]	15.977	0.168	12.064	16.000
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美元按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2.896	5.672	0.000	76.323
技术创新	专利授权数/千件	4.866	9.465	0.000	174.622
产业结构合理化	基于泰尔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0.280	0.192	0.001	1.239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1.048	0.466	0.189	5.092
资源配置效率	测度的资源错配指数的倒数	1.186	0.673	0.397	8.874

注:为便于计算和表征,将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乘以100。

4. 典型事实分析

(1)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趋势。如图2所示,在研究区间内,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2012年全部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分别为4.29、4.06、4.45、4.41,到2021年,分别上升至5.17、5.11、5.25、5.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2.09%、2.58%、1.85%、1.64%,原本排名末尾的东部城市增速远高于中、西部城市,反映出地区之间的新质生产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均值排序为:中部城市(4.97)>东部城市(4.81)>西部城市(4.79)。这表明,一直以来中部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和优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出陡然下降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2013年年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在科技、企业、市场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部署。比如,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提出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要突出以创新支撑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这迫使或者推动了诸多企业的转型。然而,在转型初期,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出现暂时回落现象。随着企业转型的逐步成功,新质生产力又迎来了飞跃式发展。

(2)城乡融合发展的演变趋势。如图3所示,在研究区间内,城乡融合发展整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全部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别为48.08、49.75、47.32、46.02,到2021年,分别上升至51.61、53.26、50.83、49.70,年平均增速为0.79%、0.76%、0.80%、0.86%,西、中部城市的增速高于东部城市,反映出地区之间的城乡融合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均值排序为:东部城市(51.59)>中部城市(49.28)>西部城市(47.86)。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2017年间,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这与已有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主要归因于经济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阵痛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转变的影响,导致城乡融合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出现了显著的波动和调整,从而在特定时期内呈现出短暂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4,44]。

(3)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事实。本文按照新质生产力均值将其划分为两组,探究不同新质生产力水平组别间的城乡融合发展差异,具体如图4所示。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点明显现象:第一,在整个研究区间内,新质生产力“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49.55和50.39,这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越高的组,城乡融合发展越好。第二,两组城乡融合发展的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56%、0.65%,反映出新质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地区,其城乡融合发展增速越快。第三,从图中整体趋势可知,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新质生产力“高水平组”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陡峭的上升态势,迅速超越了“低水平组”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种增长与图2中新质生产力水平骤然上升的时间节点高度吻合。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内在联系: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突然跃升,导致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显著增长。总而言之,以上现象初步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3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其中,第(1)列是未纳入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第(2)~(4)列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城市个体、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第(4)列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假说H₁得证。因此,地区应该合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其有机地融入城乡融合进程中,使其成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推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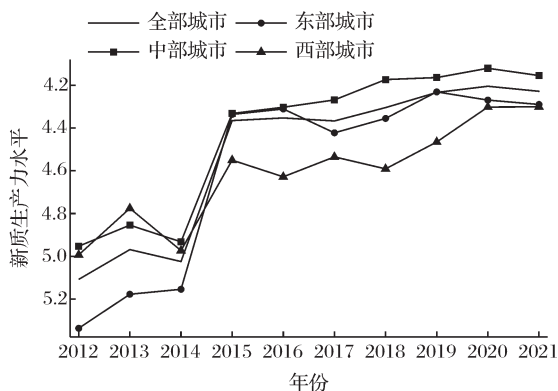


图2 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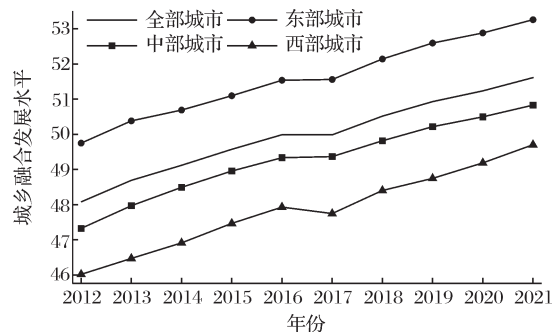


图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其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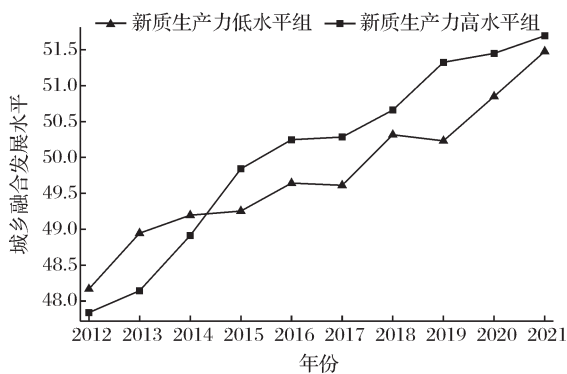


图4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事实

乡高质量发展。

2. 内生性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讨论。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以缓解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同一省份内除自身以外其余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均值为工具变量,利用2SLS进行估计。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如下:由于同省份城市距离相对较近,地区之间存在技术交流和资源竞争,因此城市之间的新质生产力会相互作用和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但因为主体不同,其余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不会对该城市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此外,为避免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的滞后项也作为工具变量加入,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新质生产力均有着显著影响,工具变量具有较强解释能力。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等均通过检验。第(2)列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问题后,新质生产力在1%的水平下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系数变大,表明内生性问题将会导致影响效应被低估。

(2)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更换变量测度方法。第一,对新质生产力进行2.5%水平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不利影响;第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第三,借鉴卢江等^[45]的研究,测度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将其匹配到各城市层面。②更换研究方法。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故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③排除城乡融合相关试点政策的干扰。国家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开展城乡融合相关试点工作。因此本文将该城市内有新型城镇化试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同时结合时间变量,构建城乡融合试点政策的DID变量纳入回归。以上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 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Preacheer等^[46]提出的bootstrap抽样法检验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Bootstrap抽样法能够克服“Sobel检验要求的数据正态分布及大样本”的限制,且可以披露中介效应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N=1800

变量	(1)	(2)	(3)	(4)
新质生产力	0.080** (0.035)	0.209*** (0.043)	0.083*** (0.025)	0.083** (0.034)
经济发展			2.009*** (0.089)	0.796*** (0.238)
人口密度			0.183 (1.982)	27.456*** (4.624)
政府干预			-0.206*** (0.054)	0.044 (0.037)
金融发展			0.140 (0.171)	-0.214 (0.178)
居民储蓄			0.934*** (0.269)	0.260 (0.270)
人力资本			0.034 (0.181)	-0.165 (0.175)
对外贸易			0.004 (0.009)	0.023*** (0.006)
常数项	49.585*** (0.172)	32.717*** (3.005)	44.836*** (3.485)	44.836*** (3.337)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R ²	0.938	0.424	0.941	0.941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为稳健聚类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下同。

表4 内生性讨论结果 N=1611

变量	(1)第一阶段: 新质生产力	(2)第二阶段: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新质生产力		0.163*** (0.047)
新质生产力的一阶滞后项	0.523*** (0.044)	
邻近城市新质生产力均值	-0.318*** (0.074)	
常数项	7.448*** (4.285)	45.860*** (3.579)
Kleibergen-Paap rk LM	103.93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81.412***	
Hansen J	0.081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R ²	0.944	0.944

注:控制变量同表3,下同。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N=1800
变量	更换变量			动态面板模型	排除试点干扰
	(1)	(2)	(3)	(4)	(5)
新质生产力	0.083** (0.034)	0.078** (0.039)	1.254*** (0.338)	0.086*** (0.027)	0.081** (0.034)
L. 城乡融合发展				0.320*** (0.040)	
城乡融合试点政策 DID					0.281** (0.128)
常数项	44.825*** (3.336)	47.042*** (3.624)	46.066*** (3.314)	29.744*** (3.250)	44.799*** (3.3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941	0.923	0.941	0.950	0.941

注:第(3)列聚类到省份层面,其余聚类到城市层面。

大小,检验功效更高。表 6 表明,所有中介机制均通过检验。首先,在技术创新层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专利授权数量,以科技创新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其次,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亦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确保城乡产业融合的稳定、高效发展。最后,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至此,假说 H₂、H₃、H₄得证。

表 6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作用机制	中介效应		90% 置信区间		检验结论
	系数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城乡融合发展	0.007	0.003	0.002	0.012	显著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合理化—城乡融合发展	0.018	0.007	0.007	0.030	显著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城乡融合发展	0.045	0.012	0.025	0.066	显著
新质生产力—资源配置效率—城乡融合发展	0.059	0.011	0.041	0.077	显著

注: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bootstrap 法估计,重复 300 次,控制变量同上。

4. 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东、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城乡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如表 7 所示,东、西部城市的新质生产力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效应大小为:东部>西部。中部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新质生产力发展增速最快,加之其稳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该区域能够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实现新质生产力推动效应的最大化。相较之下,西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一旦有创新技术的注入,其边际效应也将尤为显著。

表 7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新质生产力	0.157*** (0.052)	0.051 (0.033)	0.106* (0.061)
常数项	59.156 (185.602)	47.417*** (4.060)	-48.461 (133.1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700	840	260
R ²	0.924	0.913	0.946

(2)人才禀赋的异质性。人才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会影响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本文进一步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表征人才禀赋的变量,根据均值,将地级市人才禀赋分为“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探究不同人才禀赋下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 8 第(1)和(2)列所示,在“人才禀赋高水平组”中,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系数高于“人才禀赋低水平组”,这说明,新质生产力在人才禀赋更高的地方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强的推动效能。其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也是塑造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过程^[22],其作用过程离不开人才的参与,因此在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利用。

(3)数字经济水平的异质性。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不同数字经济水平下,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效应。借鉴赵涛等^[47]的做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来衡量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按照均值划分为“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探究不同数字经济水平下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8第(3)和(4)列所示,在“数字经济高水平组”中,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是“数字经济低水平组”的三倍多,这体现出数字经济在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表8 人才禀赋和数字经济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人才禀赋 低水平组	人才禀赋 高水平组	数字经济 低水平组	数字经济 高水平组
新质生产力	0.061** (0.030)	0.165** (0.081)	0.059** (0.029)	0.189** (0.086)
常数项	48.741*** (4.293)	1629.372** (769.510)	43.905*** (3.677)	332.403 (364.2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11	589	1162	638
R ²	0.924	0.969	0.918	0.954

四、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及动态效应检验

新质生产力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动态效应结果如表9所示。第(1)列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逐渐渗透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各个层面,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优化和资源高效配置等机制,显著提升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但当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会面临技术瓶颈、资源约束或市场饱和等问题,导致其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再像初期那样明显。第(2)~(4)列结果显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新质生产力显著正向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但影响系数和显著性逐渐递减,滞后三期、四期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别不显著和为负。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惯性”特征,这种动态影响会持续

表9 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新质生产力	0.094*** (0.034)				
新质生产力的平方项	-0.044** (0.019)				
新质生产力的一阶滞后项		0.088** (0.037)			
新质生产力的二阶滞后项			0.055** (0.027)		
新质生产力的三阶滞后项				0.010 (0.033)	
新质生产力的四阶滞后项					-0.093** (0.039)
常数项	45.933*** (3.311)	44.263*** (3.966)	48.065*** (3.392)	49.735*** (4.677)	51.907*** (5.6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00	1620	1440	1260	1080
R ²	0.942	0.944	0.945	0.948	0.951

2~3年的时间。具体而言,当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通过技术积累、政策惯性、市场培育等方式,会持续性地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之中,且这种影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这一发现不仅强调了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长期价值,同时也要根据其影响力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策略,最大化其正面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2012—2021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新质生产力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以中部地区发展态势最好。其次,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异质性分析揭示,在东部地区、人才禀赋及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关系及动态效应,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时间惯性”特征和动态影响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应加大对新兴科技和创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新技术、新业态在城乡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加强政策监管和评估,确保新质生产力能够规范、健康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第二,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根据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科学规划,精准施策,避免盲目投入和过度开发。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体系,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确保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平稳转化,推动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实现传统产业向新生产业的顺畅过渡和有效衔接。第三,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功能,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强新质生产力的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持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第四,制定差异化策略以助力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考虑东、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更偏重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应进一步巩固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引导新质生产力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方向集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优势,适合发展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链。应依托其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推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西部地区具有地域广阔、生态环境良好的优势,可以发展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产业。积极布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服务业,以及建设大数据运算中心等基础设施,以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共享,逐步缩小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差距,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谭鑫,曹洁.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集聚效应及地区差异比较——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7):44-52.
- [2] 李琳,田彩红,廖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县域的实证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1):29-39.
- [3] 涂圣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现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20(4):103-116.
- [4] 潘子纯,马林燕,田蓬鹏,等.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12):

- 3093-3115.
- [5] CHEN K Q, LONG H L, LIAO L W,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hina's evidence[J]. Land use policy, 2020, 92: 104465.
- [6] MA L B, LIU S C, FANG F, et al.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 and integration based on quality of life[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0, 54: 101877.
- [7] 刘明辉, 卢飞. 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2): 33-46.
- [8] 许彩玲, 李建建.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 经济学家, 2019(1): 96-103.
- [9] 黄大湖, 丁士军. 农业技术进步、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1): 239-248.
- [10] 孙源序, 雷娜, 刘晓倩.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 ——来自中国26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南方金融, 2023(12): 28-53.
- [11] 范斯义, 刘伟. 科技创新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及实践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3): 40-47.
- [12] 温涛, 陈一明. 社会金融化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 ——来自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实证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6(2): 46-58, 191.
- [13] 孙玉环, 张冬雪, 梁雨菡, 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24, 41(2): 87-99.
- [14] 人民日报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3-09-10(1).
- [15] 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转型逻辑与实施路径[J]. 学术交流, 2024(1): 93-107.
- [16] 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 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38(2): 11-21.
- [17] 贾若祥, 王继源, 窦红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J]. 改革, 2024, (3): 38-47.
- [18] 唐琼, 孙健. 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3): 31-40.
- [19] 燕连福, 牛刚刚.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2): 82-90.
- [20] 郭晗, 侯雪花.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1): 21-30.
- [21] 王飞, 韩晓媛, 陈瑞华.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6): 12-19.
- [22] 张林.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 经济学家, 2024(3): 15-24.
- [23] 邓玲. 习近平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蕴及时代意义[J]. 学术探索, 2024(5): 1-8.
- [24] 宁志中, 张琦.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 地理研究, 2020, 39(10): 2201-2213.
- [25] 翟青, 曹守新.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2): 15-23.
- [26] 吴宸梓, 白永秀.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J]. 当代经济科学, 2023, 45(6): 123-134.
- [27] 万长松, 徐志源, 柴亚杰. 新质生产力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2): 1-6.
- [28] 刘瑞.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国际比较与前景展望[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7): 47-59.
- [29] 方创琳, 孙彪. 新质生产力的地理学内涵及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方向[J]. 地理学报, 2024, 79(6): 1357-1370.
- [30] 令小雄, 谢何源, 妥亮, 等.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 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67-76.
- [31] 张震宇, 侯冠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6): 20-29.
- [32] 沈坤荣, 金童谣, 赵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 37-42.
- [33] 杜传忠, 疏爽, 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20-28.
- [34] 赵敏, 王金秋. 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6): 72-82.
- [35] 盖庆恩, 朱喜, 程名望, 等. 土地资源配置不当与劳动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7, 52(5): 117-130.
- [36] 宋佳, 张金昌, 潘艺. ESG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6): 1-11.
- [37] 郭峰, 王靖一, 王芳, 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401-1418.
- [38] 郑瑜晗, 龙花楼.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评价及其时空格局[J]. 地理学报, 2023, 78(8): 1869-1887.
- [39] 苏春红, 李真.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了吗?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3): 27-39.
- [40] 朱玉春, 胡乃元, 马鹏超, 等. 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2): 98-108.
- [41]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 46(5): 4-16, 31.
- [42] 袁胜超, 吕翠翠. 地方政府合作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J]. 当代财经, 2022(9): 3-14.
- [43] KLENOW H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4): 1403-1448.

- [44] 王耀晨,张桂文.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2,38(24):33-38.
- [45] 卢江,郭子昂,王煜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3):1-17.
- [46] PREACHER K J, HAYES A F.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2004, 36(4): 717-731.
- [47]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IAN Pengpeng, PAN Zichun, ZHU Yuchun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characterized by high-tec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a key driver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panel data of 180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to theoretically analyze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from 2012 to 2021,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leading the wa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w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exhibiting the best development momentum.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primarily reflected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optimizing resources alloc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e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higher talent endowments and digital economy levels. Furt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ev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dynamic effects over tim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责任编辑:陈万红)